

# “现实主义”何为?

## ——论布拉格汉学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刘云

**摘要:** 布拉格汉学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内涵丰富,主要体现在:一、认为必须借助艺术技巧才能使文学反映出现实本质;二、主张一种主观的现实主义,一方面,“现实”包含外在世界与人类精神世界,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实现取决于艺术家个性化地观看现实的方式,个人的观察、体验等是贴近和理解现实的唯一途径;三、认为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现实主义文学已从形而上的美学观念变为参与社会改造的实践形式。此外,该学派还改变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人与社会生活的抽象认识和表现,具有人文关怀与人道主义色彩。其现实主义文学观对拓展与深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内涵,促进文学介入现实生活,繁荣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现实主义;布拉格汉学派;布拉格结构主义;普实克

**中图分类号:** I0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677(2025)5-0039-08

### 引言

韦勒克在论述现实主义时曾表示:“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时代性概念,是一个不断调整的概念,是一种理想的典型,它可能并不能在任何一部作品中得到彻底的实现,而在每一部具体的作品中又肯定会同各种不同的特征、过去时代的遗留、对未来的期望,以及各种独具的特点结合起来。”<sup>①</sup>因此,对现实主义概念的理解,在不同的人那里,往往有不同的答案,也成为引发争论最多的理论问题。

现实主义对布拉格汉学派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意义重大,它既是该学派审视、剖析中国现代作家,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脉络,衡量现代文学成就高低的核心且基础的理论依据,也生动彰显了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但布拉格汉学派曾经因为自己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备受诟病,被认为只是秉持机械马克思主义对文学做政治的、教条的、功利的理解,缺乏对文学审美价值的

深入探索;或者被认为这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分析已经是一种落后的、老套的文学研究方式,在当代各种纷繁复杂的后学思想、理论范式面前,已失去了对文学的阐释能力,而秉持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布拉格汉学派,也在这种层出不穷的理论大潮中黯然失色。因此,如果想要正确地理解布拉格汉学派,就需要深入探讨这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现实主义理论话语在布拉格汉学派的文学研究实践中有何具体内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布拉格汉学派中国文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与评价。

另外,现实主义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复杂程度日益加深,文艺创作内容、形式、技巧都受到数字时代的深刻影响。现实主义在面对新的文艺现象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面对多元文化、新兴技术和虚拟世界等元素时,可能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全面反映当下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现实主义

**作者单位:** 刘云,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

① [美]勒内·韦勒克著,罗钢等译:《批评的诸种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37 页。

批评理论在解释一些具有实验性和创新性的艺术作品时,也可能会受到自身观念的限制,无法深入挖掘其中的价值与意义。因此,通过对布拉格汉学派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回顾,我们可以借此重新思考在中国新时代条件下,现实主义如何突破其局限性,构建出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理论体系,使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与批评能够焕发出新的活力,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 一、现实、虚构与象征

在布拉格汉学派这里,现实(Reality)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常常与“事实”(Fact)、“真实”(Truth)、“写实”(Recording)等几个概念相互交叉又保持区分。比如普实克认为:

在大部分情况下,所谓的写实,只是对某种特定现实的单纯记录,而不是真实的描写。两者之间存在极其重要的区别,有必要加以专门的研究。……新文学作家因为过于依赖由大量单个事实构成的现实,很难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创造出典型的故事情节,通过对特定个体及其行为的观察,得出普遍的结论。<sup>①</sup>

布拉格汉学派的上述观念源于其融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布拉格结构主义的文学观。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包含两大重要内容:辩证法与唯物史观,这为布拉格汉学派的批评实践提供了一整套系统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塑造了其对文学研究的基本态度,以及对文学发展的基本观念<sup>②</sup>,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对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认识。布拉格汉学派重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认可文艺属于与经济基础相对的上层建筑,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种,可以反映并影响外部世界,要理解一切社会历史现象与发展的规律都必须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但是这种反

映,并非留声机式的记录,布拉格汉学派格外反对那种对“事实”的机械反映,比如高利克就认为:

试图将辩证唯物主义化为“留声机器”和概念当然是错误的。虽然,“留声机器”能描写个人的表面的客观态度,而不能表示真正地面对客观现实。郭沫若要求他的“小”天才们只起留声机的作用:如实反映周围世界的声音。<sup>③</sup>

显然,如同马克思主义强调文艺需要在纷繁的社会表象中看到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并通过典型形象予以表现,布拉格汉学派也格外期待在文学作品与文学研究中,都能够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即把文学艺术及其研究导向一种科学性的范畴。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普实克的语境里,“事实”“写实”“现实”“真实”的价值是依次增高的。“真实”是最高的层次,蕴含着科学评判的要求。依他之见,存在两个层面的真实:一是大致相当于“写实”这一层面的,是“对个别事件准确忠实的描写,这通常用来衡量各种文献和历史记录中的事实性文字”<sup>④</sup>。第二个层面的真实是作家从个别事实之中抽象出来的典型现象和普遍规律,是整体上对事物的本质以及根本的社会问题的揭示,对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反映,是真正的现实,这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要求。第一个层面的真实排斥“扭曲”和“虚构”,要求如实、客观地再现事实,但是第二个层面的“真实”并不排斥想象、虚构和对现实的扭曲。正如普实克所说:

艺术家可以在纯粹由想象构筑的世界里面自由穿梭……正是经验的这种变形和漫画式的改造常常能比经验的文学再现向我们昭示更多的现实。<sup>⑤</sup>

这实际也是布拉格结构主义文学观的反映。

① [捷克]普实克著,郭建玲译:《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与艺术》,见《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89-91 页。

② 参见刘云、基语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汉学发展及其特征》,《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24 年第 3 期。

③ [斯洛伐克]高利克著,陈圣生等译:《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0 页。

④ [捷克]普实克著,郭建玲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导言》,见《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42 页。

⑤ [捷克]普实克著,郭建玲译:《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与艺术》,《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96 页。

在穆卡若夫斯基看来,文学的本质是一种符号的表意系统,生活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而文学现实则是通过符号系统对生活事实的能指化和所指化转换,即所谓“单纯记录”(写实)与“真实描写”的区别,前者停留在符号表层(能指),后者则深入符号结构的深层逻辑(所指)。虽然生活事实经过符号化会成为文学现实的一部分,但文学现实并非对生活事实的简单的复制,需要经过符号系统的加工创造转化而来。因此,从布拉格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文本作为现实之外独立自主的符号系统,其意义生成机制并非通过直接反映客观现实,而是通过符号序列形成的文本形式、结构与功能的内在关联来实现。由此,布拉格汉学派对“现实”概念的复杂性剖析本身就内蕴了符号的选择、组合与重构,包含了虚构、想象与变形的因素。正如雅各布森提出的“选择轴”与“组合轴”所示,文学中的现实呈现是特定符号选择与语境组合的产物,而非客观事实的简单复刻。在文学中,“选择轴”和“组合轴”共同作用于现实的呈现与符号表达。“选择”决定了哪些现实元素被纳入文本,以及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而“组合”则决定了这些元素如何在文本中相互关联,形成一个连贯且富有意义的叙述。

普实克曾引用萨尔瓦多·达利的画作为例来阐释文学如何反映现实。作为超现实主义领域的杰出画家,达利的作品洋溢着无拘无束的想象,并着力刻画梦境、幻觉等主观元素,与传统现实主义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但是在普实克眼中,达利的绘画正是通过超现实的想象,在对现实的扭曲中向我们昭示出更多的现实的本质<sup>①</sup>。因此,在他看来,“这种以想象力的彻底解放为最终目标的自由追求,从关照现实的态度来看,扩大了叙述的容量,使叙述可以不受约束地容纳每一个新的现实层面,不仅拓展了想象的世界,也延展了现实的范围”<sup>②</sup>,从而使现实主义文学能够包容进更多的艺术实践。通过这种方式,普实克不仅把各种新艺术、新经验都纳入现实主义的范畴

之中,而且把文学艺术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统一到了一个范畴之内,显示出思想的包容性与多元性。

可见,布拉格汉学派的现实主义观念融合了艺术自律论与他律论。也就是说,即便是现实主义文学,作者创作的目的仍然需要“把事实从现实的日常生活层面提高到诗的层面,使它们进入审美体验的领域”<sup>③</sup>。这又契合了布拉格结构主义对文学审美功能的强调。穆卡若夫斯基认为,审美功能是文学的核心特征,它将接受者的注意力引向作品本身的形式和产生的印象,而非单纯的外部事实。文学现实的建构正是为了实现审美功能,通过对生活事实的筛选、变形与重组,使其以符合审美规律和艺术表现需要的形式呈现,从而区别于生活事实的原始状态。由此,布拉格汉学派就把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文学反映现实的创作机制,进一步表述为文学是艺术地反映现实。

普实克非常强调艺术技巧对于创作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作用,象征主义就是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艺术途径。布拉格汉学派充分阐释了象征主义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比如鲁迅和茅盾都深受象征主义影响。高利克着重强调,鲁迅通过对安特莱夫“神圣的铁窗格公式”的解构与超越,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为其注入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从而使其成为现实主义文学表达的有力载体,甚至于在中国文坛开辟出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而米列娜则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象征主义不仅来源于西方文学,更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化中存在着的庞大的象征体系,这种体系依赖相似类比原则形成,对中国现代作家形成了深刻影响<sup>④</sup>。她出于对中国文化、艺术符号系统的体悟,极富洞见地传达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倾向绝非源自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纯粹模仿或被动接受,而是一种能动的转化,其最终的结果是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艺术文本同时又能以现实主义的姿态示人。

① 参见[捷克]普实克著,郭建玲译:《以中国文学革命为背景看传统东方文学与欧洲现代文学的相遇》,《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80页。

② [捷克]普实克著,郭建玲译:《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与艺术》,《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95页。

③ [捷克]普实克著,郭建玲译:《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与艺术》,《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94页。

④ 参见[捷克]米列娜著,吴华译:《创造崭新的小说世界——中国短篇小说1906-1916》,见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1-501页。

## 二、主观的现实主义

主观的现实主义在布拉格汉学派这里有两个方面内涵:

一是基于“现实”所包含的内容。普实克认为,文学“有必要按照现实来塑造人物形象,去表现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欲望、要求、需要和情感”<sup>①</sup>,因为主观的心理现实也同样具有认识、教育等社会功能,因此,“为了建立一种以真正的人性为基础的新的伦理道理,就必须表现人的本来面目……探讨人类错综复杂的心理状态”<sup>②</sup>,这也可以激发读者反抗不合理的社会束缚。因而,作者要贴近的现实,不仅有外在的客观现实,还有内在的心理现实,即主观现实。普实克以郁达夫和郭沫若为例,认为他们的作品常常呈现出鲜明的主观化和抒情性特征,与日本的私小说非常相似,但是这种主观性与抒情性又并未脱离社会现实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不是“像日本作家那样,只关注自己灵魂的颤抖”,而是“将某种个人体验与现实环境的种种联系都纳入到描写中,使(个人主观化的)描写具有某种普遍的真实性”<sup>③</sup>。这实际是把主人公的内在心理的发展变化置于社会现实语境中,强调其客观基础上的主观精神内涵,本质上并未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反映论所强调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但是未像机械反映论一般把社会存在本质化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存在的内涵与表现。

二是基于表现现实的个性化主体。布拉格汉学派认为,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不取决于作品的主题;相反,它是一个艺术方法问题,取决于艺术家如何感知、体验、描绘和评价世界。因此,在论述中国民间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时,普实克特意选用了看上去最超现实的神话和鬼怪作品,在其中寻找现实主义的因素<sup>④</sup>。布拉格汉学派的主观现实主义,与布莱希特和罗杰·加洛蒂的观点比较相似。

20 世纪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现代主义者布莱希特曾经针对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展开论争。卢卡奇认为伟大的艺术属于现实主义,他把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流派都视为一种“反现实主义”的颓废艺术。而布莱希特则主张,只要能达到反映和表现现实的目的,现实主义的形式和手段可以是多样化的,应该允许现实主义艺术运用更多创新性的手段和技巧。20 世纪 60 年代,围绕着法国共产主义者罗杰·加洛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也展开了一场关于新时期现实主义内涵的讨论。加洛蒂在他这部著作中以毕加索的绘画、卡夫卡的小说和圣琼·佩斯的诗歌为对象进行论述,认为应该把更多的文艺现象包容进现实主义的范畴,扩大现实主义的尺度。加洛蒂的观点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赞美者认为加洛蒂“摆脱了教条的美学”,“恢复了对于艺术和艺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观点”<sup>⑤</sup>;批评者则认为“如果我们彻底地把‘无边的现实主义论’应用于艺术的话”,那就会“取消了艺术认识现实和概括现实的必要性”<sup>⑥</sup>,从而也就消解了现实主义的本质。

上述论争最后并无定论,但是通过论争深化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认识。考察现实主义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布拉格汉学派所持的这种主观的现实主义其实由来已久,是现实主义发展过程中另一个未受重视的发展方向。我们通常理解的现实主义总是追求客观地表现现实,这与西方摹仿说出现以来就形成的对摹仿的单一理解——逼真的复制——有关。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比现实世界更为真实,艺术所摹仿的决不如柏拉图所说的只是现实世界的外形(现象),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sup>⑦</sup>,这其实为主观现实主义的发展留下了缝隙。在诸多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中,个人性、主观性都是曾经被强调的对象。而现实主义者所追求的

① [捷克]普实克著,郭建玲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导言》,《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70 页。

② [捷克]普实克著,郭建玲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225 页。

③ [捷克]普实克著,郭建玲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导言》,《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61 页。

④ 参见 Jaroslav Průšek, *Die Literatur Des Befreiten China Und Ihre Volkstraditionen*, Prag: Artia, 1955, pp.475-482.

⑤ [法]罗杰·加洛蒂著,吴岳添译:《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年版,译者前言第 4 页。

⑥ [法]罗杰·加洛蒂著,吴岳添译:《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年版,译者前言第 5 页。

⑦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1 页。

客观性被质疑为“为自己的犬儒主义和不道德行径寻找的遁辞”<sup>①</sup>。德国学者理查德·布林克曼在《现实与幻想》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主观性,包括主观体验、主观认知、主观冲动等,简而言之,乃是唯一的客观”<sup>②</sup>,这意味着“一部作品越‘现实主义’,就越倾向于变得‘主观’,直到它演变成印象主义”<sup>③</sup>。在布林克曼这里,“人们普遍承认的19世纪的现实主义完全被推翻了,代之以一种个人化的、原子论的、主观的现实主义”,所以韦勒克调侃说:“在德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实主义,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寻找现实主义。”<sup>④</sup>

与布林克曼的主观现实主义相比较,布拉格汉学派的理论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内涵。首先,布林克曼的主观现实主义强调主观的经验和意识是唯一的客观,具有更加本质的属性,而非一般现实。但布拉格汉学派在论述中更加强调人的内在心理、情感作为一种一般现实的客观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可以作为反映社会本质的中介,这使得反映人的主观思想、情感等的抒情性作品,首先在于其现实主义的认识价值和社会功能,通过心理描写可以通达真实存在,反映社会本质。由此,中国现代文学中抒情的、浪漫的个性化、主观化倾向,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那种着重于自我内心的情感表现也就有了本质区别。

其次,布拉格汉学派的主观现实主义指向普实克后来所论的个人经验与现实经验的融合:

个人经验开辟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通向现实,将由孤立事件构成的外部世界与消化了这些事件的内部世界联系了起来,中国艺术家要想创造出一种形式上符合新的现实观的新艺术,那么,这是唯一成功的道路。<sup>⑤</sup>

普实克这里所谓的“新的现实观”,其实把现实与艺术的支点从传统现实主义中所谓的社会现实转移到通过艺术形式表现社会现实的艺术

家主体身上了,艺术家作为个性化主体成为连接与聚焦外部世界、个人经验(“消化了外部世界的内部世界”)、艺术形式等文学作品其他要素的中介,是决定自然生活能否成为艺术创作、实现艺术统一性的核心要素。总之,布拉格汉学派非常强调艺术家的主体性,强调主体自我观看现实的个性化方式,把“个人的体验、观察、自白与判断”,“当作是贴近现实、理解现实的唯一的途径,是评价艺术作品的唯一价值标准”<sup>⑥</sup>,并未把艺术家变成生活现实的附庸或者可有可无的摆设。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布拉格汉学派在结构主义视域下,一再强调作家主体性在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作用,突出作者的个性化想象、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法在反映社会本质方面的功能,但在布拉格汉学派那里,文学创作最根本的来源始终是社会现实生活,而非人的想象、幻想、直觉等。即虽然人的内心世界可以进入文学创作的范畴,成为文学作品表现的对象,但是人的思想、精神等意识形态内容始终都是客观现实的一种表现形式,最终既受到客观现实的制约,也能够反映出某种社会历史的状况。与此同时,文学艺术发展是由内部与外部以及主观和客观各种结构要素矛盾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斯维塔克所认为的,是“在于人主观自我意识的变化”<sup>⑦</sup>。这也从本质上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划定了界限。

另外,布拉格汉学派的主观现实主义,实际上还暗含着其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路径的感知。如米列娜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经历了从客观现实主义向主观现实主义过渡的过程:

中国艺术家通过引入自己文化中熟悉的新手段,一步步瓦解了现实主义。通过这种方式,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本被大量地主观化了,按照突出的传统平行原则组织起来,并充满了在中西方文化中表面上相同,但在两种文化的符号系统中具有不同意义的符号。<sup>⑧</sup>

① [美]勒内·韦勒克著,罗钢等译:《批评的诸种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6页。

② Richard Brinkmann, *Wirklichkeit und Illusion*, Tübingen: Niemeyer, 1957, p.298.

③ W. D. Williams, Review on *Wirklichkeit und Illusion*,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Vol. 53, No. 2, 1958, pp.283-284.

④ [美]勒内·韦勒克著,罗钢等译:《批评的诸种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4页。

⑤ [捷克]普实克著,郭建玲译:《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与艺术》,《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98页。

⑥ [捷克]普实克著,郭建玲译:《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与艺术》,《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99页。

⑦ 傅其林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7页。

⑧ Milena Dolealová-Velingerová, “Editorial: The Geopolitics of Signs”, *The Semiotic Review of Books*, Vol.2, No.3, 1991, <https://semioticreview.com/sr/index.php/srindex/srbarchive>, 最后访问时间:2025年6月5日。

这一过程实际是以中国传统文学与审美规范同化西方文学理论及其范式的过程,由此产生的新的现实观不仅适应中国特殊的社会与文化发展状况,而且是对西方传统现实主义观念的一种补充与扩展。尤其是在西方摹仿论之外,布拉格汉学派发现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伦理化、道德化特征,把现实主义与中国传统“文以载道”的观念联系起来,突出了中国现实主义作家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拯救与改造社会的历史责任感与民族主义情怀:

在二十年代,一些知名作家,如叶圣陶、鲁迅甚至茅盾,开始认为,真正的文学从不是摹仿的产物,而是源于作者的深沉情感。此外,叶圣陶断言,观察并非是像西方人那样与科学现实主义显著关联,对物质世界进行冷漠的分析性审视,而是观察者道德修养的一个阶段。<sup>①</sup>

综上,经由主观的现实主义,布拉格汉学派在主体性作者、客观性现实和作为符号的文学艺术之间建立起一种能动的系统结构,解答了社会现实如何有效地进入文学文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中的两大基本问题——存在与意识——不再机械对立,而是有机统一于具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之中,这深化了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也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适应性与文学阐释能力,成为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可资借鉴的范例。

### 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现实主义

许多中西方批评家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与文学形态给予了形而上的理解。比如安敏成对中国现实主义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他认为与其说现实主义能够真正参与或解决社会问题,倒不如说它是知识分子对美学问题的回避,而且,许多西方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都自觉地将美学价值放置在政治之上,在作品中追求

一种纯粹的美学超越<sup>②</sup>。显而易见,安敏成将中国的现实主义简单地等同于西方传统现实主义并与之进行比较,在那里,“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美学理念更加侧重文学对于现实的摹仿和表现程度,与社会现实本身不应该有更额外的功利的联系。如盛宁所说:“英美文学传统中的这种‘现实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既不隐含着某种唯物主义的认知前提,也无‘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意向,它基本上只是一种‘传达与人的经验相吻合的印象’的文学表现方法或惯例。”<sup>③</sup>但是布拉格汉学派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础上,更加注意到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已经由一种形而上的美学观念变为一种参与社会改造的实践形式,承担着启蒙与救亡的历史重任。

布拉格汉学派的上述观念也来源于布拉格结构主义对文学结构的认识以及功能主义的美学观念。布拉格结构主义超越形式主义之处,就在于其并非把文学结构严格地视为独立自足的实体,而是在文学自律论的基础上考察文学他律的因素,把其置于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更复杂结构要素的更广泛的整体系统中予以考察,通过对文学与其他各个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诠释文学结构的发展及表现。因此文学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结构要素都可以成为影响文学形态及其发展的因素,甚至可能会主导文学结构的面貌。所以布拉格汉学派特别重视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分析,因为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因素会影响文学的发展。另外功能主义美学观念也在符号学的基础上把文学的审美功能与具体的社会功能动态地结合起来,强调审美功能的现实意义、实践功能<sup>④</sup>。所以,受布拉格结构主义影响,布拉格汉学派也没有把文学的审美功能与社会功能做一种二元对立的区分,在一种非此即彼的框架内认识二者关系,而是更加强调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条件对文学创作及其功能的影响<sup>⑤</sup>,认为在现代中国

① 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á, “Review on 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by Marston Anders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52, No.1, 1992, pp.303-312.

② 参见[美]安敏成著,姜涛译:《现实主义的局限: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 页。

③ 盛宁:《现代主义·现代派·现代话语——对“现代主义”的再审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50 页。

④ 参见刘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捷克的传播与接受——以布拉格汉学派为中心》,《文学评论》2025 年第 1 期。

⑤ [捷克]普实克著,郭建玲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见《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196 页。

启蒙与救亡主题占主导因素的条件下,文艺创作则很难跳出社会功能的范畴只用纯美学的观念去看待,文学最终要参与到变革社会现实的实践中来。正如普实克所说:“文学和艺术是民族斗争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sup>①</sup>

高利克紧跟普实克的观点。他在研究中注意到瞿秋白与蒋光慈现实主义观点上的最大不同:

如果说在理论领域(革命多少有所例外),他们对现实的态度是相同的话,那末在实际行动上(文学与社会—政治),他们几乎相反。蒋光慈作为“孤独的流浪者”而回避当前的现实。瞿秋白却不然,只要有会,他总是站在社会—政治与文学运动的风尖浪口。他从1920—1921年间的“唯思”之梦中“大醒”过来后,就陶醉在“当然现实”之中,在周围他想要看的,听的,或感觉到的东西,觉得都具有意义。他要了解现实,要改变它。<sup>②</sup>

相比较蒋光慈,瞿秋白更看重现实主义文学了解现实、改变现实的实践作用。毫无疑问,高利克与瞿秋白的观点更为相似,他认为真正的现实主义不是某一单纯的美学或哲学上的理念,而是一种行动,一种真正推动社会改变的社会实践。高利克指出,中国现实主义者拥有西方现实主义者所不具有的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强烈欲望,有时这种欲望强烈到甚至要牺牲文学本身的特殊性。所以,如瞿秋白、茅盾等现实主义者们,能够通过扎根群众的文学创作与实践产生强大的行动力,以文学独特的情感能量改造社会。

可见,布拉格汉学派在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观照中实际内蕴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把人类的生产活动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但物质生产是人类实践活

动的核心和基础。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实践思想的基础上,拓展了实践的范畴,“将人的实践活动从物质生产明确扩大到政治、文化乃至艺术活动”<sup>③</sup>,这不仅成为布拉格汉学派理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实践属性的基础,也深化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内涵。

当然,布拉格汉学派并非就此认为文学作为社会实践可以直接改变现实,他们并没有否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而是如前所述,以作者在作品中对社会主观化、个人化的观察为中介来实现:“在无边的文学世界中,我们看到了在现实中几乎很难觉察的迹象,观察视角的转换,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新的眼光,去重新关照现实,发现我们原先认为理所当然的关系,一下子变得荒诞、愚蠢、可笑了。这就开辟了一种可能性,使人们产生了新的世界观”<sup>④</sup>,获得了改变世界的冲动与能力。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在布拉格汉学派看来可以“向人们昭示,中国社会的处境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社会的妥协与调和都是不可能的,革命已经在所难免”<sup>⑤</sup>,从而推动人们参与社会变革。这实际上又与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实践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指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

总之,布拉格汉学派对文学审美功能与社会功能二者的关系持有更为有机、辩证的看法,不认为承认和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便必然会损害其审美功能,反而审美功能的实现与否决定着文学社会功能的实现。布拉格汉学派更多是从有关文学结构的整体性、系统性出发去理解与评价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并非“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sup>⑥</sup>,也非“执迷于文学的历史使命和文学的社会功能”<sup>⑦</sup>,而是以作者的主观个性统筹文学结构的功能范畴,在纵横的动态结构关系中进行判断,形成更加科学的研究结论。

① Jaroslav Průšek, *Die Literatur Des Befreiten China Und Ihre Volkstraditionen*, Prag: Artia, 1955, p.23.

② [斯洛伐克]高利克著,陈圣生等译:《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214页。

③ 胡亚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当代建构》,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2页。

④ [捷克]普实克著,郭建玲译:《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与艺术》,见《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96页。

⑤ [捷克]普实克著,郭建玲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导言》,见《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71页。

⑥ [美]夏志清著,郭建玲译:《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见《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33页。

⑦ [美]夏志清著,郭建玲译:《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见《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39页。

## 结 语

综上所述,布拉格汉学派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解与阐述,既受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又与布拉格结构主义息息相关,且内蕴着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体认,这使得现实主义的内涵在布拉格汉学派这里更为丰富和复杂。布拉格汉学派的现实主义观念也明显受到西方现代派影响,对现实的理解更加具有包容性,对表现现实的艺术手法的理解也更加灵活自如。他们把文学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宏大结构中,视其为促进社会变革的一种实践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是相关而必要的。显示出布拉格汉学派对现实的深刻关切以及现实主义理论的前瞻性。

另外,布拉格汉学派改变了苏联僵化的、教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个体的人和个人主义的压制,充满人文关怀与人道主义色彩。在他们那里,现实主义文学虽然关涉社会进步、民族解放、革命斗争这一类宏大历史和集体政治,却不立足于阶级斗争与抽象的人性,而是把集体话语落实于对个体的深切关注,充分理解历史中的“人”的行动、尊重不同环境中的“人”的选择,同情处于困境中的“人”的遭遇。所以,虽然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后来

逐渐“开始擦抹‘我’与‘他们’——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实践明确基础的划分,将两者都融入集体性的‘我们’之中”<sup>①</sup>,布拉格汉学派对现实主义文学的阐述也依然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个人而非抽象的阶级的人表现出极大关注。比如普实克对解放区文学的论述,在民族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宏大语境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人的觉醒与解放”的主题,尤其是普通人为实现公平、民主、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既包括现实主义作家的,也包括现实生活中的普通大众的。在他们这里,集体话语并没有成为严苛的教条或者空洞的口号,阻碍个体的发展,反而与个人主义话语一道,成功地还原了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普实克多次在文中论述解放区文学中涉及的妇女解放问题,并且看到妇女觉醒对于整个社会思想转变的巨大作用,认为这不仅反映出中国甚至可以看出整个亚洲社会大众思想的深刻变化<sup>②</sup>。这些都成为布拉格汉学派现实主义观念中值得称道的部分,对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内涵,促进文学介入现实生活,繁荣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霍淑萍)

## What Is “Realism”? —On the Prague School of Sinology’s Conception of Realist Literature

Liu Yun

**Abstract:** The Prague School of Sinology’s concept of realist literature is rich in connotation,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it posits that artistic techniques are essential for literature to reflect the essence of reality. Secondly, it advocates for a subjective realism. On one hand, “reality” encompasses both the external world and the human spiritual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alization of realism depends on the artist’s personalized way of viewing reality. Personal observation, experience, and other subjective elements are deemed the only pathways to approach and comprehend reality. Thirdly, it contends that under China’s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realist literature had transformed from a metaphysical aesthetic concept into a practical form of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Furthermore, the school altered the abstract understanding and representation of human beings and social life prevalent in Soviet Socialist Realism, imbuing its approach with humanistic care and a humanitarian character. Its realist literary concepts hold significant referential value for expanding and deepening the connot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promoting literature’s engagement with real life, and fostering the prosperity of contemporary realist literary creation and criticism.

**Keywords:** Realism; Prague School of Sinology; Prague Structuralism; Jaroslav Průšek

① [美]安敏成著,姜涛译:《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77 页。

② 参见 Jaroslav Průšek, *Die Literatur Des Befreiten China Und Ihre Volkstraditionen*, Prag: Artia, 1955, p.288.